

东方名家

2011·12·28 星期三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八方论见 · 曾建林

自由撰稿人

大专生团结阵线的阿当阿里在大专生游行争取学术自由，抗议大专法令的游行中，降下附有首相纳吉肖像的宣传旗帜，以写着「学术自由」旗帜取代，导致社会议论纷纷。执政党阵营中纷纷有人站出来斥责阿当阿里。

巫统女青年团长拿督罗斯娜斥责涉及的大专生「没有教养、无礼、不尊敬别人」。警方接获不同人士的投报，援引刑事法典504条文（故意污辱以破坏安宁）开档调查。《马来西亚前锋报》某新闻编辑更以《大专生别对领袖无礼》为题发表文章，训导大专生团结阵线应成熟。有的更以政府履行承诺

降首相旗帜风波

发200令吉的购书礼券为前提，教训大专生应懂得感恩。

阿当阿里降下首相宣传旗帜，改升写着「学术自由」旗帜，是否犯法之举？因降下印有首相肖像旗帜，就批评一个人「没有教养、无礼、不尊敬别人」，难免有些说不过去。其实，各方关注的重点，应是他降下宣传旗帜后的下一个动作。显然，他并没有对这旗帜采取任何侮辱性的举动——他没有涂鸦、破坏或焚烧旗帜。

如果阿当阿里如此单纯的举动，也被归类为不成熟和无礼、不尊敬领袖。那么我国其他更严重的事件中，如檳城有团体从椰脚街游行至光大，示威者还把林冠英肖像的海

报丢在地上践踏、撕碎和焚烧，那又该当何罪呢？巫统槟州党部的槟国阵主席许子根肖像，也曾经历相同的命运。2008年9月，某檳城巫统党要当众撕破及践踏许子根肖像。

此外，土著权威组织的成员，更是曾经在隆雪华堂外燃烧艺人黄明志的肖像海报。如果连阿当阿里降下一面首相宣传旗帜的做法，都被归类为不成熟、不尊敬他人的话，那么以上涉及各方就更不成熟，更不尊敬人了。不过，以上案例虽多，却都似乎不曾听到警方开档调查。

从道德角度来看，阿当阿里并没做出无礼和不尊敬的举动，最多是说这么做不妥当而已。也许，一些政治人物要为大选铺路，希望通过讨伐阿当阿里讨好上级。到底是谁的举动比较值得谴责，还是交于大众理性判断好了。



观念平台

庄迪澎 《独立新闻在线》创刊
总编辑 (2005~2011)
teckpeng.chang@gmail.com

1990年代以降，经济景气，且竞争失利的业者逐步淘汰，中文报业所有权集中化及集团化之后，获利可观，但编采人员的待遇并未大幅改善。倘若围攻林风者果真在意记者兼职令同业蒙羞、违背专业伦理，他们更应该批评报业主对同道的剥削。

年属古稀的《南洋商报》前副总编辑林风在11月8日的《东方日报》专栏发表一篇追忆往事的文章《追忆〈虎报〉到〈南洋商报〉历程》，提起1978年从霹靂州怡保调职首都后，为了弥补生活开支，在中华公会总部兼职撰写党要演讲词与献词，以及干训班幕后工作。升任编辑后，林风虽辞去兼职，却以笔名为《中国报》及《新晚报》撰稿，赚取稿费。

林文发表后，《星洲日报》副总编辑曾毓林和专司围攻「星洲日报的批评者」的匿名作者祭出违反新闻道德、记者操守、破坏报纸公信力等「大义凛然」的说辞口诛笔伐，甚至上纲到将《南洋商报》搞失第一大报宝座，归咎于林风「不务正业」。中文报业仿佛成了一片冰清玉洁之净土，深怕遭一名退休报人的追忆文章所玷污，进而掀起一场道德审判运动。

改善待遇避免兼职

倘若林文不是在《东方日报》发表，倘若林风不曾发表批评《星洲日报》的文章，大概不会得到这番「高规格礼遇」。记者兼职虽然不无可议，但是围攻者除了以一副「我终于抓到你的小辫子」的嘴脸，和摆出道德姿态极尽奚落之能事外，丝毫没有反省（反而回避）一个关键问题：有近两世纪历史，且业已成长为收入超过10亿令吉庞大产业的中文报业，为何无法保障记者不必兼职也能维持本身和家人的生计？就这点而言，林风坦诚交代旧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和一个契机，让吾人思考及检讨中文报业的劳动条件。

记者兼职乃报业主剥削共业

——传媒论衡（一）



批评基层员工兼职讨生活的人，如何看待企业福利依然存在调整空间，以及甚至有人据说通过取权换取私利的做法？

一般雇主不会乐见雇员兼职，因为这会减弱雇员对原有职务的投入程度、工作品质及配合度。同理，记者不必急着下班去做兼职，方有余力和时间沉淀思考、用心写好兼顾广度和深度的报导或评论。而且，新闻工作的机动性要求比办公室文书行政工作更高，记者兼职不利于报社的人力调度。记者兼职之不可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兼职所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进而伤害社会所期待的媒体公信力。

然而，中文报人兼职已然司空见惯，文字记者兼职从事翻译、助编承接书刊排版、摄影记者之余承接商品与宴会摄影，等等。新闻工作者兼职，皆因中文报业的待遇偏低，随着年龄增长和成家育儿之故，微薄的薪金无法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这正是中文报业留不住资深记者，以及记者阴盛阳衰之成因之一。

有些已然成为报业打工贵族的主管，动辄以「要发达到别处去，别进报业」批评抱怨待遇欠佳的同僚，听起来义正辞严，俨然激浊扬清，实际上不仅是久居高位高薪而不知民间疾苦，同时也是在为雇主不愿意大幅改善基层雇员的待遇和福利开脱责任。

吾人只需对照2001年5月28日代表马华公会接管《南洋商报》，较后出任总编辑的洪松坚的情况，就能具体地想像基层

编采人员的难处。洪松坚曾任《星洲日报》副总编辑、檳城《光明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他在今年7月24日向媒体同业广发一封主题为《古玉楼满纸谎言》的电邮，自揭1994年向张晓刚要求30万令吉退休金，「四个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没有着落」的问题才迎刃而解。

洪松坚其时已是顶尖高阶主管，尚得为孩子的教育费苦闷，中阶主管和基层编采人员的窘境，可想而知。更何况，基层编采人员再怎么辛劳从事兼职，也不可能赚得30万令吉。应注意的是，洪松坚自白的往事，是发生在经济条件和报业福利相对良好的1994年，与林风兼职的1970-198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显然编采人员的待遇，仍然无法让他们过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典当操守服务政客

因此，与其将记者兼职归因于个人的职业操守问题，不如说是报业主剥削记者所造成的「共业」。倘若围攻林风者果真在意记者兼职令同业蒙羞、违背专业伦理，他们更应该批评报业主对同道的剥削。1990年代以前，报份和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社苟延残喘、挣扎求存的境况，成了合理化对编采人员的剥削的凭据。然而，1990年代以降，经济景气，且竞争失利的业者逐步淘汰，中文报业所有权集中化及集团化之后，获利可观，但编采人员的待遇并未大幅改善；而且垄断局面之形成，更令职工会的努力事倍功半。

以《星洲日报》所属的世华媒体集团

为例，其2011年财政年度的税后盈利高达5,578万美元（约1亿7,650万令吉）；但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星洲媒体集团分会不同意资方的调薪方案，和资方展开历时九个月的新劳资合约谈判，最后仍碍于形势比人强，只能勉为其难接受资方「没有得再好给的」5% + RM180调薪方案（英文同业方面，《星报》和《太阳报》分别调薪13%和12.5%）。

以此背景衬托，愈加凸显，围攻一个追忆30多年前兼职的退休老报人，却对获利可观的报业集团和十大首富之一的报业主虐待基层编采人员的现象不置一词，是何其荒唐。同样荒唐的是，抓著一个退休老报人在30多年前兼职的往事快意鞭挞，却对今时今日仍然存在的更恶劣且令人不齿的另一种「兼职」视若无睹——一些明星信誓旦旦没有出卖专业和族群的编采主管，暗里收取政商权贵的各种好处，担当这些人的宣传马前卒；例如某政党党选期间，在报纸上释出有利于他们所服务的政客的消息，借以「彰显」政客的政绩，以利选情。这种「兼职」，与林风写演词的兼职，性质毕竟有所不同。

此类情事，在报界已非秘密，只要看看有些在1980年代入行，支领区区六、七百元起薪的记者，升任编采主管后却能坐拥别墅、半独立房产，知情者就心照不宣了。比起基层编采人员为生计而兼职，这些政商权贵饲养的报社贵族，其典当专业操守与同业尊严之行径更应为人所痛斥！

八方论见

为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名家》版《八方论见》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唯不设稿费。

《八方论见》内容包含政经文教，文长700字以下。来稿可电邮或传真给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人回复，敬候指教。

电邮：opinion@orientaldaily.com.my
传真：03-2692 0328